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 演进及其影响*

余翔** 王栋***

【内容提要】 美印在联合军事演习领域的合作与进展是冷战后美印关系发展最突出的成果之一。美印联合军演先后经历三个不同阶段：一是冷战结束后美印旨在扩展两国合作领域的试探性阶段，二是“九一一”事件后美印建立起各军种、多层次、多类型、例行性联合军事演习体系的全面发展阶段，三是2014年以来美印关系再调整后两国向高层次、复杂合作、多边融合方向发展的对华战略协作阶段。随着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两国军事部门间的重要合作议题逐渐成熟，两国联合军演的复杂程度和协同程度都获得极大提升，这一合作机制对美印关系的影响也愈益深入和复杂化。从美印军演合作议题发展本身的影响来看，美印联合军演加深了印度对美国的军备依赖，促进了美印军事战术一体化，增进了美印军方战略互信，加强了美印对华战略协作紧密度。

【关键词】 美印关系 联合军事演习 军事依赖 军事互信 战略协作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2.05

冷战后美印防务与安全合作是后冷战时期美印关系发展历程中最令人瞩目的合作议题。两国对防务与安全合作战略性的强调和落实、以《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等为代表的防务基础协议对印度不结盟传统的背离和突破激起关于美印是否会走向同盟或是否已经成为事实同盟的广泛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 21&ZD172)的阶段性成果。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聘正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的政策和学术讨论。这一讨论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出有效结论，但有必要从两国议题合作领域及具体进展进行研究，以便厘清当前两国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突出进展对美印关系发展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美印联合军事演习是冷战后两国防务与安全关系中发展历程最为持久、合作最为深入且兼具战略性和多种功能的议题合作领域之一，本文拟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及其对美印关系影响的研究视角，窥探美印防务与安全领域的议题合作对美印关系可能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既有研究对美印联合军演的关注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美印联合军演中较为突出的演习的专门研究，如对美印“马拉巴尔”（Malabar）系列联合军事演习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梳理“马拉巴尔”演习的演变历程，并认为影响“马拉巴尔”演习规模波动的主要因素是印度在牵制中国问题上的战略摇摆。^① 二是对美印联合军演进行整体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梳理了美印联合军演的发展情况，并从印度角度分析了美印联合军演对印度的利弊。^② 目前，学界对美印联合军演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尽管既有研究为认识和理解美印联合军演的发展态势、重要性及其影响因素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缺漏，缺乏对美印联合军演作为美印合作重要议题整体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对联合军事演习这个美印议题合作最典型的领域进行讨论和分析，从纵向演进与横向发展两个维度对美印军演合作议题进行整体总结，并通过详细的例证分析论述美印联合军演如何在议题合作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印军备依赖、军事战术一体化、军方战略互信和地区战略协作四个方面产生直接影响。

一、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历程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并不是一个稳步发展的状态，而是处于前

^① Gurpreet S. Khurana, “‘Malabar’ Naval Exercises: Trends and Tribulations,”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August 5, 2014, https://www.academia.edu/7879273/India_US_MALABAR_Naval_Exercises_Trends_and_Tribulations; Shashank Joshi, “Malabar: Modi Government Misses an Opportunity as Annual Exercise Slumps,” *The Interpreter*, October 9, 2015.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malabar-modi-government-misses-opportunity-annual-exercise-slumps>

^② Gurpreet S. Khurana, “India-US Combined Defence Exercises: An Appraisal,” *Strategic Analysis*, Vol. 32, No. 6, 2008, pp. 1047-1065.

进与停滞乃至倒退相交错但总体合作程度提升跃进的过程。^① 根据美印联合军演在不同时期战略背景和演习特点的变化, 本文将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发展历程总结为三个阶段。一是冷战结束初期美印战略调整背景下的谨慎试探和接触期(1991年至1998年), 在此期间美印军演属于试探性的小规模演习; 二是美国确立全球反恐战略背景下主动拉拢印度的快速发展期(2002年至2013年), 在此期间美印军演呈现种类繁多、军种覆盖面广以及演习机制化等特点; 三是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向硬对冲转型背景下主动迎合美国的调整提升期(2014年至今), 在此期间美印军演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出更为明显的针对中国的特点。^②

(一) 1991年至1998年的谨慎试探期

1991年在结束分属不同阵营的对立状态后, 重塑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和双边关系的需求为美印关系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印度原属冷战的“失败”阵营, 苏联解体后原来在安全领域依靠苏联的印度必须重新考虑在冷战后国际权力格局中的战略方向, 尤其是从苏联阵营中走出来的印度如何定位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与此同时, 美印在冷战期间积累的对诸多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认知差异并未因为冷战的结束而消弭。印度国内对海湾战争的强烈反对就是冷战结束后美印外交政策存在巨大分歧的典型案列。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爆发后, 时任印度总理的钱德拉·谢卡尔(Chandra Shekhar)险些因为允许参与海湾战争的美国运输机在印度加油而下台。^③ 在冷战结束初期美印外交政策存在较多分歧的背景下,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克劳德·基克莱特尔(Claude M. Kicklighter)于1991年访问印度, 首先向印度提出美印两军合作的一揽子建议, 开启了通过两军在军事演习领域进行试探性合作以构建战略互信的政策思路。^④

^① 并非所有美印联合军演都会公开或报道, 本文主要根据美军官网、印度新闻信息局官网和媒体报道中公开可查的信息整理, 并且主要统计美印例行性联合军事演习。

^②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0期,第21~49页。

^③ Sunanda K. Datta-Ray, “In the Ashes of Nonalignment, a U. S. -India Embrac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92. <https://www.nytimes.com/1992/03/06/opinion/IHT-in-the-ashes-of-nonalignment-usindia-embrace.html>

^④ Dipankar Banerjee, “An Overview of Indo-US Strategic Cooperation: A Rollercoaster of a Relationship,” in Sumit Ganguly, Andrew Scobell and Brian Shoup eds., *US-Indian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More than Words*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68.

基克莱特尔访印后,美印于1992年2月举行冷战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柚木易洛魁人”(Teak Iroquois),两国空军特种部队共同参演。1992年5月,美印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的海军常规部队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属于最基本的舰队交汇演练。此后,美印又陆续举行陆军特种部队“平衡易洛魁人”(Balance Iroquois)联合演习和海军特种部队“闪电易洛魁人”(Flash Iroquois)联合演习。“马拉巴尔”演习则分别在1995年和1996年各举行一次。由于冷战结束初期美印两国在战略上相互疑虑,政策上分歧较多,这段时期的美印军演更多地被两国视为试探性地增加战略互信的行为,因而在规模上相对较小,参演兵种比较单一,限于特种部队和海军,演习地点基本位于印度本土或印度周边海域,演习并未机制化,演习年份体现出非固定特点。而且,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印度国内反美舆情比较高涨的背景下,印度担心与美国的联合军演会引起国内民众抗议,因而在联合演习的规模、内容、地点以及后续的舆论宣传方面都尽力保持低调。尽管如此,这段时期的美印军演仍然在规模和内容方面取得一定突破。1996年,参加美印“马拉巴尔”军演的舰船数量增加到6艘。同时,美印在本次演习中首次把联合反潜演训加入演习内容。美国甚至在演习中不顾当时与巴基斯坦比较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在演习过程中派出P-3C海上侦察机,使印度有机会熟悉巴基斯坦已经订购并将用于对印战场的P-3C海上侦察机的具体性能。^①总之,这段时期的美印军演合作尽管处于小规模地试探性合作阶段,但两国很明显地体现出愿意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格局下尽快调整双边关系的态度。

1998年印度进行“博克兰—II”(Pokhran-II)核试验,美国迅速对印度实施制裁,美印军事合作全面终止,处于试探和接触期的美印联合军演也随之搁置。

(二) 2002年至2013年的快速发展期

印度核试验导致美印关系中断只是暂时的,印度逐渐开放的经济与市场、增长的国力和特殊地理位置等因素带来的平衡亚洲地区权力均势的潜能,决定了美国不会长期冻结美印关系,而是主动选择与印度建立更广泛和深入的双边关系。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一系列国际事态的发展为美印战略合作注入新的动能。其一,小布什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将中国视

^① Shashank Joshi, “Malabar: Modi Government Misses an Opportunity as Annual Exercise Slumps”.

为最可能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权力优势的国家，提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在确保中国履行“国际承诺”的同时，要“对冲其他的可能性”。^①此时，美国对华战略与同样将中国视为防范对象的印度对华战略高度契合；其二，受到寻求扩大海外军火市场的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积极游说的影响，小布什政府将扩展对印军备出口市场作为美国对印政策的优先议题。而印度在冷战结束后也基于其在军备采购方面过于依赖俄罗斯的评估结论，认为印度应尽快增加军备采购来源的多样化，尤其是应增加对美国军备的采购。此时，美国在军备出口议题上的政策需求与印度在军备进口议题上的政策需求高度契合；其三，“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印度纳入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规划中，期望通过提升印度的军事能力，让印度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印度也在“九一一”事件后宣布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政策和导弹防御计划，对小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战略原则上表示支持。基于以上三方面政策共识，美印迅速重启防务领域的合作，美印联合军演迎来快速发展期，美印联合军演在数量、类型、规模和内容上得到全方位提升，两军首次建立起针对不同作战需求、覆盖全部军种的联合军事演习机制。

首先，美印快速建立起覆盖全部军种、类型多样、交流多层次、机制化的例行性联合军演体系。2002年，美印恢复特种部队联合演习，改为年度“金刚普拉哈尔”（Vajra Prahar）例行演习。海军“马拉巴尔”演习也在恢复的同时确立为年度例行演习。同时，美印在2002年到2010年间启动了多个常规部队例行演习，包括：空军“对抗印度”（Cope India）联合演习和“对抗雷”（Cope Thunder）联合演习；海军“黑颈眼镜蛇”（Spitting Cobra）联合演习、“海上救助”（SALVEX）联合演习、“响尾蛇警报”（Habu Nag）联合演习；陆军“准备战争”（Yudh Abhyas）联合演习和“战胜敌人”（Shatrujeet）联合演习；跨军种的“联合演练印度”（Joint Exercise India）联合演习。除了海岸警卫队外，美印在所有军种之间都建立起例行性联合军事演习（见表1）。在建立覆盖各军种联合军演机制的同时，美印扩展了联合军演机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多样性。一是设置不同规模和类型的联合军演满足不同的演训需求。美印联合军演既有注重两军交流、协调配合和战略信号释放的大型综合演习，如“马拉巴尔”和“准备战争”，也有更注重交流学习效率、针对特定作战能力训练的小规模演习，如专门演练爆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06, p. 42.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及其影响

炸军械处理的“黑颈眼镜蛇”、专注两栖作战演练的“战胜敌人”和“响尾蛇警报”。二是单个演习机制设置形式的多样性。美印例行性联合军演不仅注重演训实效，同时注重两军文化和政策议题的交流。以“准备战争”为例，该演习最初以主题训练为主，2008年增设比野战训练高一级的联合指挥所演习，2009年增设两军专家对联合反恐、地区安全等战略层面议题的主题研讨，成为包含文化和社会交流、野战训练、指挥所演习、军事专家交流四个层次的较为完备和稳定的综合演习。军种覆盖的全面性以及联合军演形式和内容设置上的多样性，反映了这一时期美印联合军演合作在扩展两军技战术层面交流互鉴的同时注重对两军沟通和交流机制的建设，这对以联合军演为政策工具影响印度军事理念并形塑印度对外政策认知的美国而言尤其重要。^①

表 1 美印例行联合军事演习 (2002~2013 年)

演习名称	启动时间	演习频率	演习类型	演习内容
特种部队				
金刚普拉哈尔	1992	—	情境训练演习	特种作战，反恐作战
海军				
马拉巴尔	1992	每年一次	综合演习	反潜作战、潜艇作战、航母作战、防空作战等
黑颈眼镜蛇	2004	每年一次	情境训练演习	爆炸军械处理
海上救助	2005	每年一次	情境训练演习	海上救援和潜水训练
响尾蛇警报	2007	每年一次	桌面演习	两栖作战、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助
空军				
对抗印度	2002	—	综合演习	空中对抗，现代空运、空投技术等
红旗	2004	—	野战训练演习	空军实战对抗等
陆军				
准备战争	2004	每年一次	综合演习	反恐和反暴乱
战胜敌人	2005	每年一次	野战训练演习	反恐、两栖作战
多军种				
联合演练印度	2010	两年一次	桌面演习	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救助

注：表格内分类为作者根据美印官方公开的关于演习内容的报道整理，非官方界定。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官方公告和媒体报道等公开信息整理。

^① Gary Roughead, “The Evolving Role of Military Exercises in Asia,”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March 4, 2015. <https://amti.csis.org/the-evolving-role-of-military-exercises-in-asia/>

其次,美印重要例行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不断提升。2002年海军“马拉巴尔”演习恢复时,美印共6艘舰艇参演,演习内容与1998年暂停前基本一致,包括舰队交汇和反潜等。^①2003年演习增加跨甲板直升机登陆、登舰侦搜、海上封锁等针对恐怖主义和海上犯罪的内容。^②2005年美印首次派出航母参演,美国航母“尼米兹”号和印度航母“维拉特”号在内的八艘舰艇演练了包括舰载机互操作性训练、潜艇作战、航母作战等高度复杂的海上作战内容。^③2007年“马拉巴尔”演习举行了两次,当年第二次演习是“马拉巴尔”系列演习中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五国共派出26艘舰艇参演,包括美国航母“小鹰”号、“尼米兹”号以及印度航母“维拉特”号;演习内容包括多航母作战以及空中、水面和水下全维度的主要海上作战内容;印度空军“美洲豹”战斗机首次加入该系列演习。^④空军联合演习通常被视为最具敏感性和战略重要性的演习。美印在2002年和2003年先后启动“对抗印度”和“对抗雷”两个空军例行演习。2002年首次“对抗印度”演习为空中运输训练,2004年美印即投入空军战机进行实战对抗演练,2006年印度首次派出最先进的俄罗斯苏-30MKI战机参与近距离空中格斗、视距空战等高强度对抗演训内容。“红旗”系列是由美国主办的多国空军实战演练,以高度模拟实战对抗著称,除主办国美国外,参演国绝大部分为美国的军事盟国。印度在2002年派出观察员后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派出先进战机参与演习。陆军联合演习“准备战争”演习规模在这一时期持续扩大。2002年该演习启动时双方参演兵员总数在80人左右,为排级规模野战训练。2006年和2007年该演习野战训练规模提升到连级,参演兵员总数超过200人;2008年该演习规模再次提升,升至营级规模野战训练演习,参演兵员总数达到400人以上,并增加了旅一级的指挥所演习。^⑤

① George Iype, “All Set for Indo-US Naval Exercises in Kochi,” Rediff, September 27, 2002. <https://www.rediff.com/news/2002/sep/27naval.htm>

② Ravi Sharma, “Engagement on the High Seas,” Frontline, November 7, 2003. <https://frontline.thehindu.com/the-nation/article30219690.ece>

③ Abhijeet Sathe, “More than Expected Achieved during Indo-US Naval Exercises: Smith,” Rediff, September 29, 2005. <https://in.rediff.com/news/2005/sep/29navy.htm>

④ Mahendra Ved, “Indian Navy’s Malabar and Other Exercises,” India Strategic, September 2007. <http://www.indiastrategic.in/topstories45.htm>

⑤ Arvind Dutta, “Leading the Way—Exercise Yudh Abhyas,” The Manohar Parrikar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October 29, 2009. https://idsa.in/idsastrategiccomments/LeadingthewayExerciseYudhAbhyas_ADutta_271009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及其影响

再次,这一时期美印联合军演的演习地域开始不断扩展。1998年前美印所有的联合军事演习都是在印度本土或邻近海域开展的。2002年恢复联合军演后,美印联合军演则基本改为轮流在两国军事基地举行。借由演习地点的轮换,印度极大扩展了其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如在“红旗—2008”军演中,印度派出最先进的苏—30MKI战机、运输机、加油机编队连续飞行超过两万公里赴美国内利斯空军基地参演,在当时是印度空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行动。^①海军联合演习“马拉巴尔”在演习地域上的扩展尤为突出。从2002年至2006年,“马拉巴尔”演习都在印度附近海域举办,包括1998年前的三次“马拉巴尔”演习,演习地点都在科钦沿海、果阿沿海或阿拉伯海,集中在印度西海岸。2007年至2013年间,“马拉巴尔”演习则基本轮流在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冲绳沿海举行,演习地域从西印度洋扩展到东印度洋乃至西太平洋。

2007年以后,两方面事态的发展中止了美印联合军演的快速发展势头,合作程度甚至开始萎缩。一是中国对2007年9月美印日澳新五国“马拉巴尔”联合海军演习提出质疑,美国和印度意识到过于偏向防范和牵制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硬对冲可能引发与中国不必要的敌意和对抗,美印联合军演出现回调趋势。^②“马拉巴尔”演习在2007年以后退回到双边演习范畴,2007年后直至2017年印度未再派出航母参与海军联合演习;空军联合演习的频率被定为五年一次,且2008年以后未再举行空中实战对抗演习。同一时期,印度启动与中国的“携手”(Hand in Hand)反恐联合训练,试图进一步调整在中美之间对冲战略的平衡(见表2)。二是美印双边关系因一系列政治、贸易和外交纠纷出现困难,美印双边政治互信与合作因之动摇,美印联合军演开始出现相当程度的萎缩。^③2012年特种部队演习“金刚普拉哈尔”中断;2013年“海上救助”和“响尾蛇警报”演习未再举行;2013年后“战胜敌人”演习被取消;跨军种联合演习“联合演练印度”在计划时被确立为例行性演习,但仅2010年和2012年举办两次即未再举办;空军联合演习“对抗印度”和“红旗”同样中断;仅海军联合演习“马拉巴尔”和陆军联合演习“准备战争”仍保持了年度演习的频率,但2013年的“马拉巴尔”演习仅3艘舰艇参演,从参演舰艇数量看为历年最少。

^① “Sukhoi Shine at Red Flag Exercise in US,”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12, 2008.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Sukhoi-shine-at-Red-Flag-exercise-in-US/articleshow/3353873.cms>

^②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31页。

^③ Nicholas Burns, “Passage to India,” *Foreign Affairs*, Vol. 93, Issue 5, 2014, pp. 134-136.

表 2 冷战后中印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概况

演习名称	参演国家	中印共同参与演习时间	是否例行演习	演习规模	演习内容
海豚 0311	中印	2003	否	中国：“521”号导弹护卫舰 印度：“D53”号驱逐舰、“P63”号轻型护卫舰、“A58”号综合补给舰	海上通信操演与编队演练、海上联合搜救
中印友谊	中印	2005	否	中国：“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 印度：“戈马蒂”号导弹护卫舰、“沙达”号近海巡逻舰	联合编队组成、海上联合搜救
携手	中印	2007、2008、2013~2016、2018、2019	是	中印各派 100~150 人参演	反恐和反叛乱演练
和平使命	上合组织成员国	2018~2021	是	参演各国总兵力 3000~4000 人	以联合反恐为主题的各项科目演训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防部和印度新闻信息局公开资料整理。

(三) 2014 年至今的调整提升期

从 2014 年开始，受美印国内政局变化和中国经济军事实力进一步增强等因素推动，美印联合军事演习演进趋势再次发生变化。一是 2014 年印度人民党（BJP）赢得印度议会人民院选举多数席位，摆脱了此前印度选举中悬浮议会掣肘的情况，莫迪出任印度总理。标榜强势领导风格的莫迪执政后开始更积极地回应美国的战略诉求，主动寻求增进美印合作与战略协调。^①二是根据对冲理论体系，与目标国相对能力差距缩小和威胁认知增加促使国家在实施对冲战略时由偏重接触、网住（enmeshment）等合作性战略工具的软对冲向偏重防范、牵制、制衡等强制性战略工具的硬对冲转变。^②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对华对冲战略明显转向硬对冲，防范、牵制和制衡逐渐成为美国对华主要战略手段。美国加快深化与盟友和伙伴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印度成为美国军事合作的重要拉拢对象。与此同时，中印边境稳定状态的破坏和边界对峙的频繁发生使这阶段印度对华威胁认知快速上升，印度对华战略开始突出防范和牵制等更具对抗性的战略手

① 李莉：《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 年第 1 期，第 31~33 页。

②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第 35 页。

段，对华战略对冲形态向硬对冲转换趋势明显。因此，在军事上具有防范和牵制意义的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一时期快速恢复，并表现出明显针对中国的新态势。

首先，从2014年起美印开始逐渐恢复因美印关系停滞而萎缩或中断的联合军事演习。2014年首先是“马拉巴尔”演习规模再次恢复到10艘舰艇以上规模，美国派出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参与演习。当年日本第三次加入“马拉巴尔”演习，并在2015年成为“马拉巴尔”演习的固定成员。2020年澳大利亚重新加入“马拉巴尔”演习，并于2021年再度参演。“马拉巴尔”演习参演国扩展到美日印澳四国，在军事层面呼应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2016年美印恢复了“金刚普拉哈尔”特种部队联合演习。同年，印度空军时隔8年再次派出4架苏-30MKI战斗机、4架美洲豹攻击机、2架伊尔-78MKI加油机和2架C-17全球霸王-III运输机前往美国艾尔森空军基地参与“红旗”军演。2018年12月美印举行“对抗印度-2019”演习，“对抗印度”系列空军联合演习也得以恢复。

其次，美印在前一阶段联合演习获得的经验和互操作性基础上对部分演习进行了整合和提升。例如，美印于2019年启动了全新的“老虎凯旋”（Tiger Triumph）三军联合两栖作战演习，美国海军两栖船坞登陆舰“杰曼敦”号、印度海军两栖运输舰“加拉什瓦”号参与实兵演练，取代了此前规模较小的“战胜敌人”两栖作战演习和仅为桌面推演的“联合演练印度”。三军联合的实兵演习对不同军种的联合作战能力要求更高、更为复杂，同时也要求美印参演军队之间更高层次的互操作性和合作程度，反映了美印联合军演在部门间协调、互操作性和两栖作战能力的合作程度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提升。

再次，美印通航演练（PASSEX）有所增加且趋向复杂化。通航演练与例行性演习不同，例行性军事演习通常需要提前数月乃至一年拟定演习计划和内容，通航演练则是友好国家海军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临时在某一相遇地点举行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海军通常与印度洋周边友好国家海军举行通航演练，与美国的双边通航演练则在近几年获得迅速提升。2021年，印度两次派出舰艇和空军战斗机与美国航母战斗群举行通航演练，演习还加入了防空、空中拦截、反潜等更为复杂的内容（见表3）。“即兴式”通航演练的增加及其复杂程度的提升，反映了美印双边联合军事演习从基本的部门沟通协调、互操作性到双方军事部门的互信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印联合军演的恢复乃至进一步提升反映了美印已经摆脱曾经阻滞其联合军演合作因素的影响，开始向更高层次、更复杂程度的联合军演合作迈进。

表3 美印通航演练演习(2014~2021年)

演习时间	地点	参演军种	参演舰艇	演习内容
2018年3月25日	—	海军	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印度：“塔卡什”号	—
2018年9月	亚丁湾	海军	美国：“贾森·杜汉”号； 印度：“提格”号	通讯、机动演练，小艇作战
2019年2月	印度洋中部	海军	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 印度：“塔卡什”号	船舶操作、航海技术演进、海上骑手的交流
2020年7月20日至21日	孟加拉湾	海军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 印度：“拉娜”号、“撒雅德里”号、“什瓦里克”号、“卡摩塔”号	防空演练等一系列增强训练和互操作性的演习
2020年10月	科钦	海军	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母； 印度：—	—
2021年3月	印度洋东部	美国：海军； 印度：空军、海军	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印度：“什瓦里克”号	空中拦截、防空、反潜等
2021年6月23日至24日	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附近	美国：海军； 印度：空军、海军；	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母打击群； 印度：“科钦”号、“提格”号、P-8I海上巡逻机、米格-29战斗机	先进防空演练、直升机跨甲板作战、反潜

数据来源：Michael Colemanberry, “Theodore Roosevelt Carrier Strike Group Conducts PASSEX with Indian Navy,” March 27, 2018, <https://www.c7f.navy.mil/Media/News/Display/Article/1476618/theodore-roosevelt-carrier-strike-group-conducts-passex-with-indian-navy/>; “Indian and U.S. Navy Warships Strengthen Ties in the Gulf of Aden,” Combined Maritime Forces, September 27, 2018, <https://combinedmaritimeforces.com/2018/09/27/indian-and-us-navy-warships-strengthen-ties-in-the-gulf-of-aden/>; “PASSEX with US Navy Carrier Strike Group,” Indian Navy, February 26, 2019, <https://www.indiannavy.nic.in/content/passex-us-navy-carrier-strike-group-csg/>; Dinakar Peri, “Indian Navy Holds Passage Exercise with ‘USS Nimitz’ Carrier Group,” *The Hindu*, July 20,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indian-navy-holds-passage-exercise-with-uss-nimitz-carrier-group/article32140656.ece>; Dinakar Peri, “Navy to Hold Passage Exercise with U.S. Carrier,” *The Hindu*, October 10, 2020,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navy-to-hold-passage-exercise-with-us-carrier/article32823126.ece>; Abhishek Bhalla, “India, US Kick off Two-day Naval Exercise in Eastern Indian Ocean Region,” *India Today*, March 29, 2021,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india-us-naval-exercise-eastern-indian-ocean-region-1784682-2021-03-29/>; Dzirhan Mahadzir, “India, U.S. Navies Hold Complex Air and Sea Drills in the Indian Ocean, Kicking off Several Summer Exercises,” *USNI News*, June 24, 2021, <https://news.usni.org/2021/06/24/india-u-s-navies-hold-complex-air-and-sea-drills-in-the-indian-ocean-kicking-off-several-summer-exercises>

最后，美印联合军演在 2014 年以后出现多边化趋势，并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和体现出来。其一是原本美印双边联合演习加入新的参演国从而使联合军演多边化。例如，2015 年日本成为“马拉巴尔”系列演习固定参演国，使该演习成为三边联合演习。2020 年和 2021 年澳大利亚加入该演习，再次扩展了参演成员国。其二是美国或印度加入原本由其中一方主办的多边联合演习。从 2014 年开始，印度加入美国亚太司令部主办的“环太平洋”大型多边联合海军演习，2021 年印度加入美国非洲司令部主办的以打击海上犯罪和维护海上安全为目标的“弯刀快车”（CUTLASS Express）大型多边联合海军演习，同年印度还参与了由美国主办的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共同参演的“海龙”（Sea Dragon）联合反潜演习。其三是美印共同参与第三国主办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2021 年美印共同参与了法国主办的“拉佩鲁兹”（Exercise La Perouse）海军多边联合演习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办的“沙漠旗帜”（Desert Flag）空军多边联合演习。美印联合军演的多边化明显呼应了美国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欲使亚太联盟网络化的政策趋势，将印度拉入美国与其亚太盟友的联合军演网络体系有助于美国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为“印太”战略框架的实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每一阶段暂时停滞后的进一步扩展和提升，表明美印可以克服其战略协调的阻碍因素，推动军事合作向更深度信任、更紧密协调方向发展。当前阶段，美印已经发展出高频度、多层次、军种全覆盖、更明显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机制。

二、冷战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影响因素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发展是一个波动的过程，在合作程度整体提升的过程中出现过较为严重的中断或停滞。尽管不同时期影响两国联合军演的具体政策动因不同，但有三个因素始终在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并决定了两国联合军演发展的特征和合作水平。

（一）美国持续的战略拉拢与印度实现大国地位战略诉求的契合

冷战结束终止了美印两国分属不同阵营的状态，作为单极体系霸权国的美国和地区大国的印度面临新的权力对比格局，美国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相对其他国家在对外关系塑造中享有主动权。美国认为，印度作为前殖民

地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其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彰显了美式民主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印度从1991年开始进行的市场化改革释放了印度的经济潜能，印度的庞大人口和广阔市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印度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作为地区大国具备的权力资源可以在亚洲权力格局演变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尽管美印在核不扩散、克什米尔、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美国两党和历届政府却始终着力拉拢印度向美国战略目标和政策立场靠拢，让印度融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而在印度看来，美国的拉拢有利于其实现大国战略抱负。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深植于印度的战略文化，而霸权国的拉拢则有利于印度扩大其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地位。

基于两国战略诉求的契合，美印在发展防务与安全关系的过程中即使不时遭遇其他政治问题乃至经济因素的阻碍，仍然着力通过高层领导的政治推力和政策设计推动两国防务和安全关系的发展。在联合军事演习方面，这种基于战略诉求契合的政治推力表现为美印设立了“防务政策小组”（DPG）等高层对话机制，以政策动议形式而非依据实际安全需要设立联合军事演习。美印两军在实际行动中的安全合作仅包括联合救灾、维和培训等个案，但两国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内容和复杂程度都远超其实际行动的需要。同时，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在两国总体政治关系出现困难或缺乏高层领导的推动时即出现中断或停滞，例如印度1998年核试验招致美国制裁的时期和2012~2013年间美印政治关系因外交龃龉和经贸摩擦陷入短暂困难的时期。

（二）以联合军演为政策工具推动两国战略目标在操作层面的落实

美印两国将联合军事演习作为承载多种功能的政策工具，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建立沟通渠道，实现利益绑定，促进政治互信，进而推动美印战略愿景在操作层面的落实。联合军事演习是美国军事外交的重要内容，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涉及国家数量众多，演习数量多、频率高，演习内容和任务目标非常多样化，是美国全球军事存在和军事战略的重要构成。美国对联合军事演习的目标设置通常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通过联合军事演习了解和学习不同训练体系、技战术方法、武器装备、作战程序和信条、作战环境、作战历史，这是提升战斗经验和训练水平的重要方式。其次，美国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巩固和发展其联盟和伙伴关系，并影响参演国的军事发展乃至军事决策。最后，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宣示参演

国共同的政策主张，显示军事存在从而实行威慑。^①在实际操作中，联合军事演习包含的功能往往是多重的和复杂的，且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比如，“马拉巴尔”演习在中印边境对峙或冲突发生时期常被认为是美印针对中国实施威慑，而该演习向美日印澳的多边扩展引发战略界和学术界对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是否在军事化并可能形成对华军事包围的讨论。尽管联合军事演习的实际产生效用具有模糊性，但鉴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和数量、演习的机制化程度和复杂程度，可以确定美印两军借由联合军事演习建立的政策沟通机制和共同能力建设有助于美印共同战略诉求在操作层面的落实。

（三）美印两国战略定位的错位与调整

如第一部分对美印联合军演演进历程的分析，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在不同阶段出现中断或停滞的具体原因是不同的。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联合军演中断的原因在于美国对印度的制裁，美国希望通过包括中断两国军事交流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手段迫使印度放弃拥核并以无核国家身份接受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制约。2013年的停滞原因则更为复杂，美国和印度官方都没有明确表示部分演习规模降低或取消的原因是两国战略分歧或外交、经贸纠纷的外溢，但诸如因预算削减而取消“红旗”空军实战对抗演习这样的原因肯定不足以解释两国在联合军演上的倒退。^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空军联合演习被取消，海军联合演习规模大幅削减，部分小规模但极具针对性的演习中断几乎都在同一时间段发生，且持续较长时间，并在两国战略关系回暖后才得以逐渐恢复，足以说明两国在战略层面的分歧是引发美印联合军演波动的主要因素。

虽然美印联合军演两次波动的具体原因不同，但仔细回顾两次军演的停滞、恢复和随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即都伴随着美印战略定位错位和再调整的过程。1998年印度核试验前，美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是南亚区域大国，并主要从印巴关系平衡和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角度统筹美国的对印政策。印度则期望突破南亚地区国家定位和与巴基斯坦长期纠葛的限制，争取南亚地区以外的大国地位。印度人民党执政后立即进行核试验以及瓦杰帕伊总理在给美国总统的信中对印度核试验目

^① Gary Roughead, "The Evolving Role of Military Exercises in Asia".

^② "12 Indian Air Force Aircraft Reach US to Take Part in 'Red Flag' Exercise," NDTV, April 24, 2016.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12-indian-air-force-aircraft-reach-us-to-take-part-in-red-flag-exercise-1398724>

的是为应对中国“威胁”的强调，都反映了印度对超越南亚并在更大的地缘政治范围发挥作用的渴望。印度核试验的行为突破了美国对印度战略定位设定的目标，因此招致美国的制裁。然而，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后认为中国是最有可能对美国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国家，并开始寻求在地区层面平衡中国权力增长，而印度则被美国寄予厚望。通过与印度签订核合作协议，美国承认印度事实上的核国家地位，同时在美国对印巴政策上实施“解绑”，^① 在利用巴基斯坦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的同时提升与印度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增强印度的军事实力。可以说，小布什时期美国对印度战略地位的重新定位及相应调整举措符合瓦杰帕伊在给克林顿的信中提出的愿景。在这一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得以恢复，而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全面提升。

考察 2013 年前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出现停滞和恢复的战略背景可以发现，美印间再次出现战略错位和调整。印度虽然将中国视为长期的战略对手，但印度认为与中国竞争的方式应该是增强自身实力，因此印度的不结盟传统在冷战后仍然得以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为战略自主，即印度对外政策应该在各大国关系中保持平衡，为印度自身发展和实力增长创造最佳外部环境。但奥巴马上台后认为小布什时期美国给予印度过多而收获太少，^② 要求印度要获得美国的战略支持不能仅关注提升自身实力，还要在对外政策上对美国战略提供更多支持，尤其是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配合美国提升针对中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印度则认为美国要求的战略回报会打破印度在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不符合印度战略自主定位。两国战略定位再次出现分歧，并引起两国战略关系框架下各议题合作的停滞。以莫迪为首的印度人民党上台后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印度对战略自主的定义，以“多向结盟”取代了曾经的“不结盟”传统，^③ 印度不再坚持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而是选择向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盟友体系密切靠拢。莫迪政府的新战略定位迎合了美国逐渐强化的针对中国的战略调整，以此为背景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再次获得突破性进展。

① Nicholas Burns, “Passage to India,” p. 139.

② Sunil Dasgupta and Stephen Cohen, “Arms Sales for India,” *Foreign Affairs*, Vol. 90, Issue 2, 2011, p. 23.

③ 李莉：《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对外战略的对冲性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2期，第77~95页。

在两次战略定位错位与调整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并开始突出其针对中国的特征。从这一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美印对彼此战略定位的契合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演进特征和合作深度。

三、美印联合军演对美印关系的影响

联合军演作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重要议题和外交工具，其作用和影响已经不限于参演军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程度提升，尤其在美印联合军演已经发展为两国较为稳定和成熟的部门间合作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在议题合作领域取得的发展成果对美印关系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影响。

（一）印度对美国军备依赖加深

开发印度的国防装备采购市场和扩大对印度武器装备出口是美国推动与印度联合军事演习发展的重要因素。印度也同样期望通过联合军事演习考察美国武器装备的性能，为印度采购美国先进武器装备提供更结合实战经验的参考数据。考察美印联合军演的内容可以发现，美印成功交易的重要武器装备都在联合军演中有所体现。联合军事演习促进的美印国防装备交易是单方面的，即美国装备对印度的大量出口。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渴望的技术转让和依靠技术转让提升印度国防工业自主性的需求没有实现，因而使印度对美国军备的依赖程度更高。

结合美印联合军演和美国对印军售可以发现存在一个“军演—军售—军演”的循环路径，即美国通过军事演习展示武器装备和军事能力，随后向印度出售相关武器装备，再通过联合军演培训印军对相关武器装备的使用能力。联合军演中对武器装备的展示与考察，为印度对美国相当一部分重要武器装备采购打下基础。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从2005年到2020年，美国对印度军售每五年的总额分别是31.4亿美元、68.7亿美元和72.4亿美元，其中超过10亿美元交易的武器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奇努克运输直升机、C-130J 赫拉克勒斯运输机、C-17A 全球霸王-III 重型运输机、MH-60R 海鹰反潜直升机、P-8A 反潜机（见表4）。这些武器基本都在美印联合军演中出现过（见表5）。其中，美印之间大额度交易的武器装备在同类型武器平台中都是技术上领先的，且被印度视为在与主要对手中国竞争中保持优势的重要砝码。如C-130J 赫拉克勒斯运输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被部署在中印争议边界的印军前线，可以有效提

升印军人员和装备的机动能力和火力支援能力，弥补印度相对中国军队机动能力的不足；印度空军上将达诺亚（Birender Singh Dhanoa）曾就相关武器装备的引进表示，这对印度而言是改变游戏规则的能力。^①

表4 单笔订单金额接近十亿美元及以上的美国对印军售（1990~2020年）

订单年份	装备名称	类别	订单数量	订单金额 (亿美元)
2008	C-130J 赫拉克勒斯运输机	运输机	6	9.62
2009	P-8A 波塞冬反潜机	反潜机	8	20
2011	C-17A 全球霸王-III 运输机	重型运输机	10	41
2013	C-130J 赫拉克勒斯运输机	运输机	6	11
2015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	22	14
2015	CH-47F 奇努克直升机	运输直升机	15	10
2016	P-8A 波塞冬反潜机	反潜机	4	11
2020	MH-60R 海鹰直升机	反潜直升机	24	26

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

表5 美国对印军售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平台
在美印联合军演中的参演情况（1990~2020年）

武器平台	参演年度	军演名称
P-3C 反潜机 ^②	1996、2002、2004、2007、2012	马拉巴尔
P-8 A 波塞冬反潜机	2016、2017、2018、2020	马拉巴尔
	2021	海龙
	2021	通航演练
C-130J 赫拉克勒斯运输机	2002、2009、2019	对抗印度
C-17 全球霸王-III 运输机	2009	对抗印度
奇努克直升机	2020	准备战争
阿帕奇直升机	2020	准备战争

注：以上数据为不完全统计。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官方公告和媒体报道等公开信息整理。

① Daniel Kliman *et al.*, “Imbalance of Power: India’s Military Choices in an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October 23, 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imbalance-of-power

② P-3C 反潜机是 P-8A 反潜机的更老版本。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重要和关键武器装备的交易过程中几乎不涉及印度渴望获得的技术转让。由于美国对先进武器装备技术出口的限制、美国企业对先进技术转让的获益考量、美印在武器装备技术转让保密性难以保障等程序问题上的不协调、印度国防装备采购中的程序和官僚障碍等因素,印度通过对美国武器装备进口实现技术转移从而增强印度国防工业自主性的目标一直难以实现。^① 尽管通过“主要防务伙伴”的地位指定、《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的签署、战略贸易授权地位提升等措施,美国放宽了对印度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但美国对印度的先进武器装备技术转让仍然几乎停留在承诺阶段。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向印度转移 F-16 战斗机生产线曾被媒体集中报道宣传,但这种虚假的宣传集中体现出美印在先进武器装备技术转让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和困难。^②

美国对印度武器装备出口额度的快速增长、相应先进武器装备在印度军事部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印度通过技术转移实现自主能力期望的落空,使得印度对美国武器装备进口的单方面依赖越来越严重。因此,通过美印联合军演推动的美国对印度武器出口大幅增长实际上加深了印度对美国的军备依赖。

(二) 美印军事战术一体化

通过美印联合军演,美国向印度展示了美国在军事装备、作战技术、作战理念上的先进性,并通过进一步的武器装备交易、作战理念的借鉴和吸纳,促进了美印军事战术一体化。军事战术一体化影响美印共同作战能力的发展。对美国而言,加强与印度的战术一体化,培养印度成为其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的协助者以分担美国的战略成本,是美国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就开始大力发展美印战略关系的关键动力。由于印度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理念主要源自冷战时期的苏联体系,再加上印度长期以来将本国的安全关切集中在南亚地区和克什米尔问题上,印度的作战理念与拥有强大“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能力的美国存在很大差异。为了鼓励印度与美国在军

^① Cara Abercrombie, “Removing Barriers to U.S.-India Defense Tr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anuary 18, 2018.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8/01/10/removing-barriers-to-u.-india-defense-trade-pub-75206>

^② Abhijit Iyer-Mitra, “F-16 Never Stood a Chance to Be in IAF Fleet, Lockheed Martin Messed it up So Much,” *The Print*, July 30, 2019. <https://theprint.in/opinion/f-16-never-stood-a-chance-to-be-in-iaf-fleet-lockheed-martin-messed-it-up-so-much/269699/>

事战略和战术上实现一体化,美国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向印度展示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和作战理念,吸引印度在其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对美国装备和美国先进的作战理念进行借鉴吸收。近年来,美印通过不同军种、不同系列的联合军事演习对很多战术设计进行演练,其中对一些战术设计进行反复联合演练。例如,美印海军“黑颈眼镜蛇”演习针对爆炸军械的处理进行演练;“战胜敌人”和“响尾蛇警报”演习旨在重点培训印军的两栖作战能力;综合性演习“马拉巴尔”既包括登舰侦搜、海上封锁等针对低烈度战争的作战内容,也包括潜艇作战、反潜作战、海上空中作战、水面作战、航母作战等聚焦传统安全威胁的作战内容,美印在历次“马拉巴尔”演习中反复演练这些内容;美印空军演习频次虽然没有海陆军那样高,但高烈度的空军战机对抗和空中运输训练也多次出现在美印“红旗”和“对抗印度”系列空军演习中。

通过对不同战术设计及其重点的反复联合演练,印军卓有成效地借鉴吸纳了很多美军先进的作战理念。如美印空军战机对抗演练帮助印度空军更好地了解 and 熟悉了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在现代空战中的应用,美空军的作战经验和理念被纳入印度空军相应的作战能力开发建设规划中。美印在两栖作战方面的联合演训对印度两栖作战能力的建设至关重要。印度的首支海军突击队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培训,印度还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在印军内部传授与美国联合演习获得的两栖作战经验和能力。印度向美国购买两栖船坞登陆舰“特伦顿”号则是基于认同美军在现代两栖作战中发展海上火力支援能力重要性的作战理念。美印联合军事演习还帮助印军的军种间联合作战能力发展,尽管印军军种间联合作战能力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美印“联合演练印度”指挥部演习和“老虎凯旋”实兵三军联合演习都是以军种间联合作战为主旨的,这两个演习项目都使印军的军种间作战能力实现初步的协调性。^①与此同时,美印联合军演推动的美印军备交易也进一步加强了美印战术一体化。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对P-8A波塞冬反潜机的引入。从1996年开始,美国在“马拉巴尔”系列演习中多次投入P-3C反潜巡逻机参与反潜演习,该反潜机在演习过程中体现出的海上巡逻、侦察和反潜能力得到印军肯定。因此,印度2009年果断向美国订购8架P-3C的更先进版本P-8A波塞冬反潜机,该机型于2012年到2015年间

^① Gurpreet S. Khurana, "India-US Combined Defence Exercises: An Appraisal," p. 1054.

完成交付并列装印度海军。2017年开始,印度海军投入该型反潜机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同型号反潜机共同参与“马拉巴尔”、“海龙”、通航演练等演习中的反潜演训。参演国家都认为,共同的武器平台加强了各国在反潜作战上的协同操作性和兼容性,对美日印澳四国在未来的海上冲突中保持战术一体化和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①

(三) 美印军方互信增强

美印联合军演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建立起包括各层级、各军种、各部门间较为稳定的军事部门间合作机制,这种军事部门间的直接沟通与合作机制对美印两国军方的政治互信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在冷战中分属不同阵营以及两国在政治价值、国际安全等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冷战结束后相当长时间美印两军中从基层官兵到高阶军官相互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联合军事演习作为一种部门间合作机制,演习规划、筹备和进行的过程自然会促使两国基层官兵和指挥人员的直接沟通交流,这种沟通交流有效地纠正了美印两军之间存在的认知偏差。比如在美印两军演习大量出现之前,美军中存在一个关于印军的流行看法,即印军在作战纪律和作战意志方面比其他地区大国的军队薄弱。美印联合军演中印度军队展现出的作战精神和演习状态,极大地改变了美军的这一刻板印象。^②

同样,印军对美军的认知偏差也非常普遍。美国军事专家在2018年完成了一份关于参与印度军事学校学习的美国军事人员的访谈报告,通过美国军事人员的体验和感受考察从1979年到2017年间印度军事人员(包括从少校到中将的各级一线军官)对美国认知的变化。根据这份报告对1991年后参与印度军事学校课程的美军学员的访谈内容,美军学员接触到的三分之一以上印军学员对美国持负面观点。这些负面观点包括:认为美军作战能力和作战纪律低下,美军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技术装备领先;认为美军对世界安全的作用是负面的,美军的行动对地区安全局势经常造成未曾

^① Megan Eckstein, "Australia to Join U.S., India, Japan for Malabar 2020 in High-End Naval Exercise of 'The Quad'," USNI News, October 20, 2020. <https://news.usni.org/2020/10/20/australia-to-join-u-s-india-japan-for-malabar-2020-in-high-end-naval-exercise-of-the-quad>

^② S. Amer Latif, "U.S.-India Military Engagement Steady as they Go,"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20, 2012, p. 27.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publication/121213_Latif_USIndiaMilEngage_Web.pdf

预料的负面后果；认为美国经常错误地选择支持巴基斯坦，并且以后很可能继续如此；认为美国不应该在印度洋部署兵力，而应将印度洋地区的安全维护任务交给印度。这份报告还指出，在对美国持积极或者中立态度的印度学员中，绝大部分具有与外军交流合作的经历，而持极为强烈反美观点的约10%~15%的印军学员则几乎完全没有对外交流经历。该报告反映出军事交流对促进印军对美军的积极认知和态度具有重要影响。^①

借由军事演习建立的美印沟通交流机制促进了美印双方对彼此作战能力、安全关切、战略意图的积极认知，两军积极的相互认知对数十年分属不同阵营的美印两国开始探索发展两国战略关系的意义尤其重要。冷战后的美印防务和安全合作是一个两国基于地缘政治变化和安全战略需求而由政府高层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印度国内长期存在的对美战略疑虑曾被认为是阻碍美印战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② 如果作为两国政策建议的重要发起者和作为两国政策执行主体的美印两军以更加积极的认知看待对方，美印战略关系发展的基层土壤无疑会加速美印高层战略合作的步伐，因为美印两军基层之间的战略信任是更加难得的宝贵战略资源。正如一位印度指挥官所表述的那样：“危机时刻，军事力量可以立刻联合在一起，但信任和合作却不能突然生成。”^③

（四）美印对华战略协作加强

从美印联合军演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看，联合军演逐渐加强了两国在对华战略协作上的紧密程度。从美印联合军演第二阶段开始，制约中国军事力量成为两国军演进展的重要动因，但中国因素在这一时期更多地体现为美印两国从长远角度对中国的战略防范。美国期望通过与印度建立联合军事演习机制提升美国对印度武器装备和作战理念现代化过程的影响，促进印度军事能力的提升，增进美印军事互信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和军事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印度会自然成为中国力量发展的平衡者。因此，印度在这一时期加强与美国在联合军事演习上的合作，其主要目的是增强自身实

^① David O. Smith, "The Wellington Experience: A Study of Attitudes and Values within the Indian Army," Stimson, September 30, 2020, pp. 69-72. <https://www.stimson.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TheWellingtonExperience-SA-100820-WEB.pdf>

^② S. Amer Latif, "U. S. -India Military Engagement Steady as they Go," p. 9.

^③ Shishir Upadhyaya, "The Indian Navy and the Pivo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8, No. 1, 2015, p. 141.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及其影响

力而非制约中国。在此背景下，美印联合军演在 2002 年至 2007 年间虽然发展迅速，但其重点依然是强调美印合作而非制衡中国。尽管“马拉巴尔”演习在参演成员上拉拢更多中国周边国家、在演习内容上重视反潜的做法被媒体认为是有意针对中国的证据，但在中国于 2007 年对美日印澳新“马拉巴尔”演习提出质疑后，该系列演习迅速退回到双边演习状态。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回忆，澳大利亚宣布退出演习并没有在华盛顿引发任何波澜，印度尽管对澳大利亚的退出感到愤怒，但自身也在回应联合军演是否针对中国这个问题方面表现犹疑不定。^① 印度在此后的对外联合军事演习中也开始注意保持某种程度的平衡，避免美印军演中针对中国的色彩过于明显。例如从 2007 年开始，印度开始与中国举行“携手”反恐联合训练，印度也一直拒绝美国发出的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避免造成美印在太平洋地区联合围堵中国的态势，印度对美国“环太平洋”军演的拒绝直到中国也被邀请加入该演习为止。

经历 2013 年的美印军演合作低潮后，美印联合军演在第三阶段表现出明显针对中国的特点。首先，美印在 2014 年逐渐恢复一度停滞或萎缩的联合军事演习项目，通过再次提升美印联合军事演习频率和复杂程度，印度公开回应美国基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提出的在亚太地区加强与盟友伙伴的联合演训、将联合演训作为实现美国军力轮流部署、增强地区军事存在的军事战略。^② 其次，印度对美国领导下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的态度从原来的谨慎对待发展为积极参与。印度开始积极参与美国或美国盟友主办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如“海龙”、“拉佩鲁兹”、“弯刀快车”等演习。通过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印度最终接受并配合了美国将多边军事演习作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多边机制建设的战略思路。^③ 最后在 2020 年，印度接受澳大利亚再次加入“马拉巴尔”演习的要求，美日印澳“马拉巴尔”演习最终补足“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合作的军事层面。印度在 2020 年“马拉巴尔”演习后发布的官方声明中首次提到，该演习体现出

① Kevin Rudd, “Why the Quad Alarms China,” *Foreign Affairs*, August 6,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06/why-quad-alarms-china>

② “US to Bolster Military Presence in Asia-Pacific: Panetta,”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1, 201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news-archive/print/us-to-bolster-military-presence-in-asiapacific-panetta/>

③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当代亚太》，2015 年第 3 期，第 20 页。

对“一个自由、包容的印太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公开承认该演习正是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支持。^①从印度最终拥抱美国印太战略并积极邀请中国周边国家参与联合军演可以看出，印度正在试图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合作加强美印对华战略协作的紧密程度。

结 语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事演习的演进是一个既有前进也有停滞的过程，但每次暂时停滞，美印联合军事演习都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冷战结束初期，作为美印试探接触与扩展两国关系合作面的政策工具，两国特种部队和海军联合演习开始以小规模和不定期的方式举行，其发展态势因印度核试验中断。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后重新定位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将印度视为亚洲均势的潜在一极，同时美国极力拉拢印度作为其全球反恐战略的伙伴，作为建立美印战略互信、提升印度军事能力、扩展印度国防装备市场的多重战略工具，美印联合军事演习获得快速全面发展，建立起全军种、多层次与内容多样的例行联合军演体系。但美印军事合作的快速发展破坏了两国对华对冲战略的策略平衡，在接收到中国的质疑信号后美印联合军演发展转向低调，又由于美印经贸和外交关系的齟齬而进一步萎缩。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后主动迎合美国对华战略往硬对冲转换，通过联合军演的进一步提升配合美国对华施压，将美印联合军事演习整合进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多边网络联合军事演习体系，明显强化了其对华针对性色彩。当前阶段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不再只是聚焦美印合作和战略互信提升，而是更多聚焦两国对华战略中军事手段的协同和配合，也不再只是受美印整体政治关系态势的变动而起伏，而是反过来对美印关系产生深入和复杂的影响。总体而言，美印联合军演在提升美印互信和合作的同时，加深了印度对美国的军事依赖。

印度国内支持美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战略意见往往认为，美国全面启动对华战略竞争是印度的战略机遇，印度应该抓住这一战略机遇，证明印

^① “Malabar-20,”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November 2, 2020.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669481>

冷战后美印联合军演的演进及其影响

度具备美国印太战略赋予印度的战略角色所需要的能力和决心。^① 印度提升与美国联合军事演习的频率和复杂程度，积极加入美国的多边联合军演体系，重新恢复美日印澳四边军演机制等举措都体现出印度越来越主动回应美国的战略需求。然而仔细考察美印联合军演对美印关系产生的复杂影响会发现，美印联合军演的效果更符合美国的政策设计初衷，距离印度所寻求的增强国防装备自主性和对外政策独立性目标则似乎愈来愈远。美国对印度的先进技术转让仍然处在承诺阶段，与中国关系对抗性的加强却在实质性增加印度的安全压力，对中印经贸关系的附带影响也在损害印度的经济利益。如果中印关系的对抗性继续强化，美印的对华战略协作可能从美国更需要印度向印度更需要美国转变，但印度向美国战略“投诚”能否获得其期望的战略回报将难以预料。

(编辑 毛悦)

^① Darshana M. Baruah, "India in the Indo-Pacific: New Delhi's Theater of Opportunity," Carnegie Endowment, June 30, 2020.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06/30/india-in-indo-pacific-new-delhi-s-theater-of-opportunity-pub-82205>

remains limited in general. Finally, the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that can help manag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s.

KEY WORDS: Modi Administration; India's China Policy Agenda; Anchoring Effect; Strategic Autonomy; Cognitive Limitation

Repeated Games, Complex Competition and Dynamics on the Sino-India Border

By Cao Pengpeng & Feng Huaixin

ABSTRACT: The Sino-India border conflict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simple competing territorial claims, and instead is rooted in a complex set of realistic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repeated games, border conflicts tend over the long-term towards predictable and stable cooperation as rational players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following a retaliatory strategy of tit-for-tat. The theory of repeated games roughly explains the basic logic that India and China followed in gradually de-escalating the border conflict following the 1962 border war. While so,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conflict in the China-India border region has increased, especially since 2020 when a violent conflict broke out in the Galwan Valley, leading to an ongoing standoff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because of complex competition around the respective status of India and China, and related to their geo-strategic space, as well as due to dynamics vis-à-vis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has started to experience a form of ontological insecurity. If India wants to overcome its current passive position vis-à-vis the border standoff, it needs to enhance its deterrence vis-à-vis China.

KEY WORDS: Repeated Games; Border Conflict; Complex Competition; Ontological Insecurity; China-India Borde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Joint U. S. -India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y Yu Xiang & Wang Do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 S. -India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outcomes of U. S. -India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evolution of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can be split into three respective phases: First was a pilot phase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at aimed to expand U. S. -India cooperation; Second was a phas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multi-dimensional and routine joint exercises at many levels between multiple branches of the U. S. and Indian armed forces following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third i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vis-à-vis China that has emerged since 2014, an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form

of U. S. -India relations that is tilting towards high-level and more sophisticated cooperation, including multilateral initiatives. As joint exercises between the U. S. and India gradually become a more mature element of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complexity and intensity of the coordination involved in the exercises has increased, which in turn has enhanced the depth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U. S. -India relationship. Turning to how the development of joint U. S. -India military exercises has impacted the broad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 find that it has functioned to increase India's dependence on U. S. military hardware and served to integrate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at the tactical level. This has in turn enhanced U. S. -India military mutual confidence and strengthened U. S. -India coordination vis-à-vi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KEY WORDS: U. S. -India Relations;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Military Dependence; Military Mutual Confidence; Strategic Coordination

A Global Value Chains Perspective on Outlooks for and Limitations of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By Huang Zhenglia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Indo-Pacific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a geographical concept into a geo-political strategy. A key factor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will effectively progress is the relationship in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s between countrie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dia's input-output rel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Australia makes up the Indo-Pacific industrial chain. India's role within this chain is largely as a "producer", receiving raw materials and providing for market demand. However, due to structural flaws and limitations within India's manufacturing sector, India's role as a producer is forced to limit in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which not only places India at the margins of the core industry in the Indo-Pacific, but also makes it difficult for India to receive industry transform from within the region. These are key limitations on India's econo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and they also imp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t present, India is implementing economic reforms targeted at overcoming its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on the backward state of its industrial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India is protecting its domestic market, while build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nnection as a means of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ke in India".

KEY WORDS: India; Indo-Pacific; Global Value Chains; Industrial Structure;